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春秋史笔】	历史的悲剧人物和悲剧性的历史：	
	读《张春桥家书》有感	宋永毅
【抗拒遗忘】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文革”	许子东
【读书随笔】	上山下乡运动的得与失	丁 东
【一面之词】	回忆江青同志	戚本禹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春秋史笔】

历史的悲剧人物和悲剧性的历史：读《张春桥家书》有感

• 宋永毅 •

毛时代的中共高层人物大都不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们或者并不真正懂得他们要“无限忠于”的毛泽东思想，抑或只是利用这一口号来谋求个人的权力和家族的私利。和他们相比，张春桥无疑是一个异类。如果说今天“张春桥”的名字还在公众中有什么难以磨灭的记忆，一定是他在1981年公审中以罕见的沉默表达的对法庭的藐视。这一形象不仅构成了对审判的公开挑战，还表明了他至死不渝地忠实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当然，在“你死我活”的中共政争潜规则下，张春桥还是被打着毛泽东旗号的法庭以反毛泽东的罪名判了“死刑缓期执行”，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历史悲剧人物。此外，中共还严密地封杀了一切来自张春桥方面的信息，使他最终成为一个被脸谱化了的反面人物消逝在公众视野里。

这一禁忌，直到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张春桥家书》的出版，才被轰然打破。该著作不仅以张春桥被囚于秦城监狱后的53封家书向公众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历史人物，更以他女儿张维维的长篇访谈，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文革内幕。这些，对于今天的学界构筑一个多维的、接近于真相的文革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家书》还揭示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完全是一段悲剧性的历史，它不仅在毛的政敌和民众中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人间悲剧，还在他的最忠诚的助手及家庭中，制造了凄惨的悲剧。张春桥在文革中的崛起，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跃而成为政治局常委和毛最看得上的“接班人”，主要是得益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真髓的理解和发展。尽管张自我定位为毛的学生，其实他也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之一。毛泽东并不是先有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才在对照检查中发现刘少奇的问题，进而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而是先下决心打倒刘少奇，才制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论体系。而一小批极左派的精英理论家，包括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实际构筑者。例如，闻名中外的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继续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就是王力等人（包括张春桥）从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中引申和系统化出来的。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中出现了不少这些文革派理论家比毛泽

东本人更狂热于毛主义、甚至而被毛打倒的奇怪现象。如“王关戚”的倒台便是一例。再如、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革命后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准备按毛在《十六条》中的方针搞真正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结果马上被毛喝停了。简言之，相比较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张，毛则是一个叶公好龙的多变政客。

看完《家书》，恐怕最为震惊人心的是：在“四人帮”被抓之前，张春桥就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了自己可能被害的危险，这个位极人臣的毛可能的“接班人”甚至连一杯办公室里的水都不敢喝——下毒的可能来自汪东兴和他掌握的中央警卫部队。而当张春桥和其他文革派的重臣请求毛撤换汪时，毛轻轻的一句“我用惯了他”便回绝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的担忧，在抓捕“四人帮”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汪东兴。此外，毛一方面认定张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却选了华国锋做实际的接班人。因此，其实是毛为华国锋日后一网打尽最忠诚于他的张春桥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权力基础。在我看来，不就抓捕的是非而论，张春桥等人的悲剧的关键来源却正是他们无限忠诚的毛泽东和他的文革。说毛最终葬送了最忠诚于他的文革派其实一点不为过。尽管张春桥在生前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家书》却给读者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张春桥在1981年被判决后，在秦城监狱中被允许看报和听海内外广播。因此，在他的家书中也有不少评论时政的段落。可惜的是，张春桥泥古不化于自己的“主义”，对文革并没有什么应有的反思。这种思维停滞的后遗症在长期坐牢的风云人物中并不鲜见，可称为革命造成的“活化石”现象。对一个“理论家”而言，至今还用早已过时的文革的理论来分析改革和“苏东波”后的国际情势，至死还憧憬着再来一次二十一世纪的文革和共产革命，绝对是一种被革命异化了的現象，只能给人啼笑皆非之感。

张春桥在他同级的高级干部中，生活上廉洁的也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在个人婚姻上也算是比较重感情的一个。他妻子文静是一个有过变节行为的女干部，但张一直没有和她离婚。直到张得知毛泽东可能会进一步重用他，才开始违心地考虑和文静离婚，托人在上海另挑选对象。后来却因为政治风云突变，打断了他们的被迫离婚。张春桥在晚年被监视性地“保外就医”后，文静则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来到他的身边照顾他、并携手走了完人生。从这一点上来说，张春桥的婚姻倒是因祸得福了。然而，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到为张春桥所忠实于的“革命”的残酷和可怕：它不仅在政治上吞噬了它最忠诚的儿女，还差一点吞噬他们的爱情和婚姻。

充当毛泽东的助手发动文革，张春桥当然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应当对这一场民族灾难负有相当的罪责。但作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他却不应当被简单地脸谱化，而应当获得公正的评价。

□ 原载香港《明报》“读书”专栏 2015年8月2日

~~~~~

## 【抗拒遗忘】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文革”

• 许子东 •

河西：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从否定“文革”到淡化“文革”，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在当下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许子东：我可以给你看网上读者对我著作（指《重读“文革”》，许子东著——编注）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一条：“我们现在70%普通工人的生活，比‘文革’时候是好还是不好呢？”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不能算是五毛，也不是捣乱，而是有一种普遍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现在活得比当时更苦了，或者更累了？”你看，还有这一条，更激烈一点：“眼看着‘文革’后平反的精英掌权了，眼看着掌权的有了特权了，眼看着特权腐败了，眼看着腐败分子移民国外了，眼看着工人下岗、我们吃起地沟油了……”这就是用“文革”的思维来思考今天的社会矛盾。这样的问题，我说重一点，是中国多少年来策略性地遗忘工程导致的结果。我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还是希望有历史反省的，但是其策略呢，是在否定“文革”的立场上，采取不谈论不涉及的方式方法，这样的方式方法是不是有问题的呢？

河西：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来看“文革”？

许子东：我在网易答网友问时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是顾及毛主席的形象而避谈他晚年“30%”的错误，那么这是对他的伟大估计不足，对中国今天的成就估计不足！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今天执政的合理合法性估计不足！如果你的思维还停留在1979年邓力群为叶剑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那个阶段，那就等于无视这30多年的发展成就！我说重一点就是这样。你自己看不到自己做了些什么，或者自己都不相信改革的成就，那不是滑稽的一件事吗？

邓小平已经说的很清楚：“三七开。”这已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的伟大是不需要怀疑，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父嘛。但是如果把大家当傻瓜，只能说他好，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一次我在电视节目中说：“毛主席1949年之后的影视形象好像近几年不太多了。”有人还较真说：“纪录片里有啊。”那是纪录片，不是影视作品。影视作品中毛主席形象的缺失，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是要把他晚年“30%”的错误完全消磁，只表现其“70%”的功绩。第一，这不尊重历史；第二，你也对不起毛主席，为什么？因为毛主席很看重他晚年的“30%”，你把这“30%”全部删除，毛主席会满意？

再说，对今天就很危险了。如果没有“文革”，那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从学术和文化上来讲，再坏的东西也要研究。我们不要法西斯重演，但是难道法西斯就不要研究了吗？学术问题谁都明白，关键在于公众场合，对于老百姓你讲还是不讲？其实这里有一个利害权衡的问题。

以前在国家中掌权的，要么是干部，要么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顺顺利利入党的那一批人，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掌权的有些可能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在网易回答问题时也说：你在十几岁时做的重要决定，包括参与的重要政治运动，会影响你的一生。当初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今天都会出现。“文革”之后的精神反省，绝对是个现实问题，很多现在发生的事，“文革”中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南方朔有句话，“每个中国人，如果能找回‘文革’中的自己，反省‘文革’中的自己，就是中华文化复兴之势”。这话很重，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复兴，不需要回到孔子、王阳明，能反思你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好了。你看看你当时是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老师和孩子的？或者还是孩子的你是怎么对你身边的朋友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动物凶猛》中那样来审视和检讨自己，中国的很多问题就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了。

河西：在《重读“文革”》的开头，你也引用了阿多尔诺的名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阿多尔诺是站在他的“否定辩证法”立场上，否定理性和同一

性，认为现代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疏离和否定；“文革”以后，中国文学一度也曾经走向阿多尔诺预期的方向，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但是很快就回流，这是否说明了阿多尔诺理论的破产？

许子东：中国的现代主义很可惜，根本就没有健康地发展。中国的文化工业和政治管制在1990年之后，在客观效果上，似乎形成了某种很好的“共谋关系”，共同压制了知识分子和先锋派。在政治上，他们不希望你们思考；经济上的开放则导致商业资本进入，文化工业不鼓励你们思考，他们只要能挣钱就好了，所以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和国际资本，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虽然各自的动机还不太一样。从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他们要借用商业手段来转移大众的兴趣和口味，他们可以从中赚钱，得到好处，而在某些大众眼中，这还是一种幸福——因为很多人的口味已经是Hello, Kitty的趣味。一直到今天的“文化大发展”，其实仍然是这样的思路。

国际资本只是为了赚钱，而且他们背后的政治策略是改造，他们觉得只要社会商业化、非政治化了，它就不太可能走向专制。但是在客观效果上，他们共同压制了中国各种阿多尔诺式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努力，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还在，要你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做什么？所以，在中国，批判文化工业的声音就变得很薄弱。而且，稍后，从海外回来的学者，他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和中国的现实结合，形成了“新左派”。所以批判文化工业在中国变成了批判资本主义。问题在于，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呢，只批判“商”，不批判“官”。你要知道，中国的现实是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那么客观上，他们又变成了官方的帮手。新左和老左又很容易重归于好，在自由派看来，新左派和老左派比较起来，不过是换了一套新的理论，终极目的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始终不能在中国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声音。到现在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最有力、最尖锐的，还是老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茅于軾用亚当·斯密的学说批判中国，所谓的“市场万能论”、“个人权利”，最多是哈耶克的学说。新左派以后西方知识分子主流的声音，大家却听不到。

新左派到了中国以后，我个人觉得，没有发挥它在西方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它们很快就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流共谋。很多学者的研究方向就变成论证毛主义的现代性了，甚至为“文革”的合理性辩护，这是中国很特殊的情况造成的。

我们从学理上来分析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大众看不到这一层，他们觉得，Hello Kitty很好，开心又安全，又能得到政府的保护，有什么不好？

河西：你在《重读“文革”》一书中也批评了《芙蓉镇》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说，你觉得优秀的“文革”小说存在吗？你觉得“文革”写作是否受到压制？

许子东：我觉得，关于“文革”，优秀的小说一直存在，只是被边缘化了。改编成电影的不让宣传，不让公映，像《生死疲劳》这样的小说，即使得了奖，小说具体写了什么，也不能在媒体上多谈，因为那是替地主翻案的故事、质疑了土改，能在公共媒体上讨论？像张炜的《古船》，也谈到了土改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走了一种双轨制，知识分子、学者，你们去探讨、总结革命历史教训，你们去写，但停留在先锋派的小圈子里、文学界的小圈子里，反正也就几万人读，随便你们去，也不来批判你，批判了反而帮你成名。它还给你地位，政协委员等等，开会还叫你去。但是呢，它严格控制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纸、杂志、电视、电影，一般人不看纯文学了，如果他们只看影视，那么他们看到的永远是光辉形象，永远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什么惨烈的真实的历史在影视中！

《活着》没有在内地公映，很快也被淡化。为什么不能公映呢？《活着》在我看来，根本就没说什么，可是有些人总是有顾虑，怎么办呢？我是很温和的态度，我觉得他们有顾虑，采取这样的措施一定是有道理的，目的也都是维稳，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没人想破坏社会。但是凡事不能只顾眼前。在正常社会中，各种职业的人群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制衡关系，政治家、哲学家、媒体之间可以制衡，而我们国家比较一元化，一方制约其他所有的人，这就让他们的一些做法变得让我们觉得无可奈何，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做法就是正确的。

河西：在“文革”小说中，有一位特别的作家是王朔，他的《动物凶猛》就描写了完全不同的、阳光灿烂的“文革”记忆，你是否觉得不同的个体，对于“文革”的记忆是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许子东：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得很不错，就是这样的作品在之后也很少出现了。这部作品很真实地表现了对“文革”的另外一个视角。

当时推荐给我的还是两个批评王朔的批评家：陈思和和王晓明。他们都曾经批评王朔，但是他们私下里都跟我说，王朔的《动物凶猛》写得很好。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非常好，比姜文改编的电影还要好！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基本上是一个青春片，拍的是人的成长。王朔的小说更复杂，有两层意思：一、在“文革”中，有一些人，既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也不是直接的迫害者，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第二、他确实写到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那些天真善良的孩子，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迫害他人的凶神恶煞？虽然在小说中只是用砖头来砸人而已，在“文革”中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行为，但是他仍然是千千万万个“文革”参与者中的一员。虽然他没有忏悔，但是他写出了那种真实的历史。他们这些参与者，和现在在网上拍板砖的，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你看他们拍板砖，就像在“文革”中，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往往是为了向旁边的哥们儿证明自己有种。

《动物凶猛》这样的作品可惜太少，也许正因为太少，所以我才记得那么清楚。张艺谋的《英雄》之后，那就进入商业大片的时代，大家都在拼命圈钱，基本上就是市场行为，但绝对也是政府引导的产物。

河西：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呢？

许子东：中国人现在做事是非常聪明的，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你要跟他说7、8不可以，他们在4、5的时候就收手了。我不想说他们主观上怎么样，但在客观上，都变成了遗忘工程中的一分子。包括我写到的这些小说，他们当时写作发表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在记忆历史、见证历史、控诉历史、铭记历史，但是客观上，他们都是在帮助人们忘却、误解、解脱、逃避历史。之所以这次我重新修订出版这本《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一方面是因为本来这方面的著作就很少，第二是这个课题的确存在，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吧。大体上，我们这个民族，对“文革”这段历史，采取了两种遗忘的方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通过叙述来遗忘，通过讲出来来遗忘；90年代以后呢，索性就采取一种封闭式的遗忘方式，基本上不提，好像这个事就不存在了。其结果可能现在掌权的人也想不到，我们的GDP增长了这么多，以前我们一个月吃一回肉，现在肉多到冰箱里都放不下，可是还有人感受说不如“文革”时期，这怎么可能？他们不明白，人的感受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衡量的。而且，那些抱怨的人的论调和语气，和1966年时的红卫兵，颇有相似之处，历史真是很妙，你越是想要甩掉它，它就越容易粘上你。

河西：你的书里详细讨论了张承志。我们知道，张承志《金牧场》和《金草地》是一个故事的两个文本，最初是《金牧场》，后来他将《金牧场》删改为《金草地》。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金草地》。《金牧场》中关于日本的大量意识流描写在我看来太过繁复了，对阅读有很大障碍，从文学本体上来考虑，删改也是很正常的，您是否更多的考虑了他精神层面的需求？

许子东：《金牧场》和《金草地》很有意思，是一部小说的两个文本。《金牧场》先发表，《金草地》是张承志对自己之前的《金牧场》不太满意，因而做了改写，主要删改了其中主人公在日本东京担任访问学者的留日生活场景。

原本《金牧场》描写了四种生活状态：当下的留日生活、若干年前考察青海新疆、“文革”中期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知青生活以及作为红卫兵长征串联的故事，让四种身份交织在一起：中国人、学者、知青及红卫兵。

《金牧场》删改之后，的确叙述更为明确，但同时，也使得“文革”时期的故事被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他的精神诉求也变得更为强烈，少了一份自我反省。

大家都知道，张承志是第一个红卫兵，你看他和蒯大富这样的人就不一样。我也认识蒯大富，在深圳和他见过面，他现在已经成功商人了。蒯大富和张承志就很不一样，蒯大富有点随波逐流的意思。当年流行造反，他们就造反；现在做生意是主流，那么他们就下海。骑墙，看风使舵，中国太多这样的人。而张承志不是这样的人，他的言论很可怕，他站在回族的立场上看问题，他的逻辑也有混乱的地方，但是他有坚持；而且，他有人格魅力。

河西：你的《重读“文革”》其实是用普洛普的一套结构主义方法来系统分析“文革”小说，我有个想法，如果按照你的普洛普式解读方式，并佐以二手资料，在理论上是否就可以炮制出一篇“文革”记忆的小说？

许子东：可以，完全可以，其实也根本不用通晓我分析的“文革”叙事模式就可以了。

□ 摘自《凤凰周刊》

~~~~~

【读书随笔】

上山下乡运动的得与失

• 丁 东 •

最近，我读到赵杰兵的新著《康庄往事——一位北京知青的记忆》（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引发了很多感想。

我认识赵杰兵已经40多年了。1972年，我和书中谈到的姜斯栋在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共事。我们都是从基层抽上来的知青。赵杰兵和姜斯栋是北京四中同学，又是同在康庄插队的好友。因姜斯栋的关系，我认识了赵杰兵。后来在80年代中期又见过一面，当时赵杰兵已在中组部工作，到山西出差，曾经天南海北，畅聊一番。以后虽再未见面，但还是听说过他的消息。因为和王小波是朋友，曾经参与他出书斡旋，和他姐姐赵洁平来往倒多一些。王小波的小说生前难出，生后火爆，赵洁平当时在华夏出版社供职，趁领导出差之

机，顶着风险让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大陆付梓，因而我对她的胆识怀有敬意。最近和姜斯栋相约去中日友好医院看望调研室老领导吴象，赵杰兵嘱他将这本回忆录赠我一阅。

这本书主要是讲述知青时代的理想和奋斗。赵杰兵1968年底离开北京，到山西省山阴县康庄插队。对他来说，知青经历是人生之旅上的正能量，延续至今。他就读的北京四中是全国名校，同学多有远大抱负，也的确涌现了一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精英。文革开始后，赵杰兵父亲被打倒，母亲受审查，他个人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在政治逆境中，他却在康庄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穷队，生产的粮食不足以果腹。队长换来换去，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困境。无奈之中，推举一个不肯上任的社员充当队长，那个社员就任的条件是，让赵杰兵担任副队长，和他搭班子。在中国的干部体制中，最基层的官员只到公社一级。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领导，还是农民身份。生产队副队长，虽不在干部体制序列，但总是掌握了一点公共权力，如何行使这点公共权力，会影响到上百号人的生计。在副队长任上，赵杰兵做了几件事，拿主意买化肥，带社员到干渠争水，一年下来，全队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以后他又当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他说自己后来职务多次变动，官越做越大，但带来的兴奋都不能与担任副队长相比。这是实情。在逆境中能够掌握一点公共权力，操持众人之事，并有所成功，的确影响了他一生的抱负和走向。1970年代中期，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谓梦寐以求。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天石也是北大毕业，为了调进近代史所从事学术研究，前后奋斗了18年，才如愿以偿。而赵杰兵却主动要求离开研究所，回到插队的地方当公社干部。了解他的生活轨迹，方能理解他这一非常之举的原因。他对乡亲的感情的确比一般知青更为浓烈。后来担任了高级干部，还想为当地做事，寻求大型国企赞助，邀请知青共同捐资，终于帮助康庄打成两口深井，让当地老乡喝上了甜水。我也插过队，也曾和底层农民一块儿受过苦，对赵杰兵那种被称为“农民党”的情怀，颇能理解。

单这一条线索不足以引起我议论的冲动。我更想讨论的是另一条线索，即有关作者父亲的线索，本书着墨不多，不足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但他的父亲对知青运动的影响却实在不可小视。而书中只在不经意处提了一句，他是为上山下乡运动划句号的人。

赵杰兵的父亲名赵凡，1916年出生，2010年逝世。94年的人生之旅，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大历史看重他的，莫过于为上山下乡运动划句号。论职务，他最后是副部级。按说，这么大的社会运动，轮不上他这个级别的干部来划句号，但他偏偏就成了划句号的关键人物。1978年，赵凡出任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正是在履行这一职务的过程中，他留下了可以载入史册的足迹。不久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面有个鲁局长，其原型就是赵凡。凤凰卫视曾有一个栏目口述历史，聘我担任顾问。我当时就建议做一期采访赵凡的专题。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得赵洁平从旁催促，总算在赵凡90高龄时，录制完成并播出。

1970年代末期，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大地，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式微，社会情绪怨声载道。政府因为无力安排上千万知青回城就业，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只允许插队知青返城，农场知青则视为已经解决就业，不允许返城。这个决策马上引起了农场知青的反弹。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知青，举行了大规模绝食抗议。赵凡受中央之命，到云南调查处理，本来中央的意思是让他说服知青服从政府的决定。但他到现场以后，才知道云南农场知青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作一些小修小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中央刚刚作出的决策行不通。于是他紧急与四川、上海等地方领导协调，最终说服中央作出新的决定，允许农场知青自愿返城。一时间，大多数知青重归故里，与父母家人团聚。因此，这些知青称赵凡为“知青之父”。作为中共高级干部，在关键时刻，不是坚持贯彻上意，而是顺乎民意，推动上意的改变，这样的例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赵凡此举也成为后世

美谈。实际上，赵凡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不久，他就离开领导岗位离休了。正是这一举措，使大批知青回城待业，冲击了1950年代形成的城市就业由政府包下来的计划体制，引发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复兴，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向市场转型。这个深刻的变化，可能连赵凡本人都始料未及。

赵杰兵早在文革前刚上高中时，就曾萌生过学习邢燕子、董家耕等知青典型的念头，还到知青典型赵耘下乡的地方体验了一个月，于是主动要求辍学下乡。当时赵凡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分管农业，他给儿子浇了一瓢冷水，还请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亲自和儿子辩论，说服他高中毕业前不要下乡。可见赵凡当时就不赞成城市中学生下乡。十几年后，发动知青上山下乡的毛泽东已经作古，赵凡成了终结这场波及千万人的运动的推手。赵杰兵在书中引述了赵凡2006年对知青运动的四点看法，有肯定有否定，看起来很辩证。如果真是得大于失，赵凡又何必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上山下乡划句号呢？

自从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人登上大位以后，大陆媒体有意无意形成了把上山下乡运动当作一代人成才之路的美化倾向，有的声音甚至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伟大创举。我不否认，不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如果有青年自愿到农村，到边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服务公众，造福底层，施展抱负，放飞理想，都值得尊重。其实，在某些政治运动中，不少曾经造福百姓的知青没有得到应有的善待，使那些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同龄人寒心。比如知青孙立哲在陕北那么受农民欢迎，清查四人帮运动中却差点被整死。然而对于更多的知青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善待他们的理想追求，而是如何尊重他们过常态生活的权利。文革年代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自愿者其实不是多数，而是少数。许多人下乡不是第一选择，而是不得已。毛泽东1973年给李庆霖写信以后，知青下乡被当成必须维护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制度上进一步强化，规定每个城市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只允许一个子女留城就业，其余必须下乡两年以上，方可招工、升学、参军。这种靠国家力量实施的强制性安排，对当事人来说是无奈的接受。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要求公民必须服兵役，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要求中学毕业生必须下乡。知青下乡后，能否回城，如何回城，也没有制度保障。多数知青无意追求掌握公共权力，自身的命运被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所操控。为了改变命运，太多的知青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改革开放的好处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松了行政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把选择职业的权利还给了社会，还给了百姓。如果承认国家应当尊重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权利，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应当从整体上否定。这才是历史应有的判断。

□ 原载《共识网》

~~~~~  
【一面之词】

回忆江青同志

• 戚本禹 •

1950年5月， 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南海的政治秘书室工作，那年我十九岁。

政治秘书室的全称叫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会）政治秘书室。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是江青，田家英和彭达彰。秘书室主要是为毛主席服务的。毛主席常把它称为是“我的秘书室”。

.....



## ◇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

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任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

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 ◇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

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不就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虎；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谈，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

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老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

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渠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谗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 ◇ 江青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谈，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离开北京去武汉前，找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号开会。林彪，总理都参加了。大家都反对主席在这种时候去武汉。但主席执意要去。主席就叫杨成武跟着他去。汪东兴急着说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说汪东兴一起去好。主席问，你那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汪东兴说，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让我代理主任。会后，江青让我好好把办公厅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说，那汪东兴不是要怀疑我想夺他的权了。她说，你那么多顾虑干嘛。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从这些情况看，江青对汪东兴还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后，她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可能是江青长期经历的那种环境造成了她不轻易相信人的习惯，而且她也不轻易地说人好话，即使是她认为是好的人。她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较坏的。容易怀疑人。对人的看法好走极端。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其实，那时

说的劳改，并不是去劳改农场的那种，而是下放去工厂劳动。这事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江青对这个服务员因误会而生怀疑，不能送人家去劳改。所以就把她换到一个不让江青看到的岗位去了。可这个服务员为了这事就非常恨我。后来她的领导跟她说，人家戚本禹是保护你才调你走的，你还瞎说人家。后来我出狱后，这服务员还写信给我，表示道歉，说她当时因为我把她从江青那里调走的，所以恨我。江青的护士长许春华也经常挨江青的批评。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时，却能公正地说，江青虽然爱怀疑人，主观片面，喜欢指责人。但她是忠于革命，忠于主席的，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也不讲享受的。她仍认为江青是一位好首长，好同志。

我在中南海后楼研究室时，工业组有个同志，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来是在山东德州开辟地区的一个老干部，地委书记，又能打游击，又能搞工业。我去中央文革后就请他来做我的秘书，这人很有经验，给我帮了很多忙。红卫兵运动刚开始时，有些情况很乱，有些所谓老红卫兵，就是后来联动那些人乱打人，乱抄家。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中央文革的头上的。因为当时都说红卫兵是我指挥的。我说中央文革可从来没有叫谁去打人的，这些人怎么乱搞呢。他跟我说，这些打人的他们后面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确地表示了态，不准打人，不准乱抄家。后来我们把乱打人，乱抄家的情况报告给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当时有些地方借破四旧，烧书。他马上跟我说，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要烧书的。怎么可以烧书呢。我就马上去讲话，制止烧书。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看见了他，就找我过去，说那人不是后楼的么，有些人是刘少奇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在身边？他年纪都比你大，是你领导他，还是他在领导你？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调走。我出狱后碰到靳耀南，他对我说，你是个好人的，我过去怎么看你，现在还怎么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这不能怪她。办公厅到处都是杨尚昆的人，她当然对我有戒心的。

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 ◇ 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看出问题。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



中央文革开会调查这事。关锋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但是他的文章是经过陈伯达批准的，而且陈伯达在上面还加了一些字。陈伯达不承认，说他不知道。总理就当场叫人去调文件来，可文件被陈伯达拿回去了。总理又叫陈伯达的秘书去陈伯达那里找文件。结果文件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写的，照发。陈伯达没办法，就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了，糊里糊涂的，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也明白，这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这个震动就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总结了，说，看起来这个文章是经过陈伯达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了。头脑不清楚。那关锋当时也没有把文章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所以还是要由关锋负责。

拿今天的话来说，王力在外交部动了总理的奶酪。当时我也去外交部跟造反派讲过话。但我是严格按照主席说的话去说的。主席没有说的我不能乱说的。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么，打倒也没什么了不起么。打倒了可以再保么。而王力从武汉回来后，被当作英雄来看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得了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武汉的时候其实是闯了祸的。主席已经对他很不满意了，只是为了维护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威信才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的。他听到外交部有人对我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己把他们找来和他们谈话，那就是所谓王八七讲话。他讲的就出格了。总理把它告到了主席那里，说王力说的，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但王力自己后来坚决否认他说过这话的。姚登山听了王力的讲话回去传达，主席让人调来了王力讲话的纪录，有这话。也可能是红卫兵在传的时候加上去的。主席就很不高兴了，说，外交部的权是中央的，怎么可以随便夺权呢。

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边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

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

出狱后，我和关锋讲了这事。关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是真的，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的，是有感情的。所以关锋从来都不反江青。但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却把江青骂得一塌糊涂。还有个叫杨银禄的，我在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还是个小战士，那时他见了江青那个样子，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幅卑躬屈膝的样子。是恭敬得不得了了。

◇ 江青和我

把王、关隔离后，我实际上也已经无所作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烦，弄得别人反感，所以有些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可是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开打倒王、关的会议我没去参加。马上外面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所以第二次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后一次中央文革会议我都去参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国庆前回到北京的。当时中央文革会议上分工由张春桥写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写国庆社论；我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编毛选，对主席的讲话风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汇总。

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我在整理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突出了这一点。因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主席对我的整理的东西很满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什么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张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本来引述的毛主席的话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觉得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因为我想革命总是先内而外，从逻辑上讲，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们看了都觉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说好。所以就改成了“要斗私批修”。

我给主席写了个检讨，我说，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写：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主席给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发下去的，可总理也没让印发。而且我看出，总理对这事并不起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陈毅说，不拿掉戚本禹，党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不稳。可见我们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凑巧，还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这个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跟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她是在中央文革的会议室（钓鱼台十六号楼）讲的。文革小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们都坐在江青的对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后面，他当场作了记录。谈了有三，四个小时。

江青说，你们老听了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你们又不好来问我。那我就把我的历史全都跟你们讲了吧。请你们审查。

她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但他的缺点是太小器，很软弱，胆又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他要说那个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都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顺的。但是她说，唐纳比起俞启威来那简直是差得太多了。当时我们就很坦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是俞启威的家里反对。他那个家族是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你一个戏子根本就进不了门。她说，俞启威那个时候也软弱。不过那时他才是二十多岁的学生，也根本没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结婚后就不一样了，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的，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了。这个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她在台上演过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过她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尽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并不乱搞的。但对待家庭，他还完全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了。和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她说她总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种时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岛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像哥哥一样的保护着她。那时有好多人就想趁虚而入，来占她便宜。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动机不良的。所以想方设法地拒绝他们。可这些人达不到目的，就到处去散步流言蜚语，造她的谣。这些人当时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她说她最难忘的还是和俞启威的初恋。俞启威是她的导师，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见了毛主席之后，她就认定，这辈子就跟定这个人了。我当时确实是有为江青写一个传记的想法的。我觉得她的经历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女性的典范的，哪里会想去整什么“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有人提出要开放图书馆，文艺组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连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了这个报告。但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去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现在应该把事情推给下面，说是文艺组干的，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给他们说话。你不这么说，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这个人就是缺心眼，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推给了他们，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向我报告过，是经过我同意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无独有偶，稍后一点时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我，让我来处理。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可他们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说他们把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里了。这个他们却没跟我讲。我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

（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那可能错误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给江青，因为，这不符合组织的原则。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因为它也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为了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将来可以卖身投靠别人。后来张春桥私底下跟我说，我们已经是都绑在一起了的，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真是事不过三啊。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又是关锋的秘书，后来江青要找个秘书，我就把阎长贵推荐给她。他不知错了什么劲。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叫江倩的写的信给了江青。江倩（中国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旧社会的一个电影演员，参加过军统。文革时挨群众批斗。她就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阎长贵拿了信，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是曾经参加过军统。说这是敌人的造谣，应该让公安部来处理。然后就把信和条子送给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现在你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没说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自己（江倩）历史上参加过军统，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旧社会当过演员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你在当演员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那时江青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找人写信的方法来陷害她。这件事，连总理也帮不上忙了。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阎长贵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胡说八道，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来，你坐牢是活该，可害得我也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这事发生以后，就规定我不能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过来几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请假检讨”。汪东兴就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房间里。那年春节过后，王关戚一起都被送进了秦城监狱。与我被捕的同时，文革的快报组被解散，文革办公室和中南海秘书室的许多人也都被隔离审查。汪东兴把他们都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党。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时间，连张春桥，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顾虑的，因为好多事情我们都是联着一起做的。所以他们一直都一直不说话。籍以自保。主席也长期不讲话。

红旗杂志从1968年第一期，还是我拉着姚文元一起签字后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红旗的副总编），这以后红旗就停刊了好几期。直到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他们才找到了宣传的纲要。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

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逢先知。如果按照逢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 XX。但是，我想她在那个“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于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打倒杨余傅，军队倏然无声。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 摘自《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